

尊重辩证法*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毛主席在上述发言中还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毛主席说这话是有深意的。赫鲁晓夫就是不懂得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 本文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给高级党校学员讲的《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中的一部分（全文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书）。收入本书的这一部分，文字上作了某些删节。

下面的许多干部，干劲很大，的确都是好干部，可是很多人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也实在太严重。特别表现在经济工作中，只购不留，越统越死。这种现象在下边随处都可以看到。胡耀邦同志在辽宁海城牛庄公社等地的调查材料中说：农民对近年来各种主要农业产品的收购任务过大表示不满。他们说，种花生的吃不到花生，种麻的没有绳子用，种烟的没有烟吸，种果树的没有水果吃，养蚕的不光买不到绸子，还吃不到蚕蛹。……这几年，有些产品实际上统统购光，有购无留，或者留量极少。

还说：近年我们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农民批评说，近年来农村经济害了一种“死症”。经济工作最忌死，我们却犯了这个大忌。特别是五八年以来，提倡大购大销，什么东西都统起来，管起来，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甚至连生猪屠宰也要实行一把刀政策，农民连下水都吃不到。由于我们把农村原有的购销渠道堵死，把一切商品价格管死，破坏了商品生产规律，结果是，一购什么，什么就少，少了什么，就统什么，三类物资都提成了二类物资，最后又变成了“奇缺物资”。

其实胡耀邦同志在辽宁海城所见到的这种现象，是今天农村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在牧区收购皮毛，不给牧区留皮毛，牧民没有皮毛，等于农民没有棉、布。要研究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把经济工作做死了？这是由于我们有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在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做经济工作的原故。他们不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辩证法的道理。如果要把农村经济工作做活，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那么，起死回生之术就只有辩证法，就是说，必须学会用辩证法做经济工作，这是做经济工作的艺术。因此，我想到经济工作人员特别是商业工作人员必须学点辩证法，必须学懂“将欲取之，必

先与之”的道理。

形而上学的方法，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所描述的，“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思维的反映即概念乃是各别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他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他的说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为鬼话。’在他看来，一个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而又其他事物。正与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与结果相互间也同样处于固定的对立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中文版，第131页）

这就是黑格尔所批判过的“非此即彼”的方法，要就是这，要就是那，如康德的著名的“二律背反”学说，就是这样。

康德想证明，理性在试图认识世界时，必然会自相矛盾，可是对于这些矛盾，理性却无法解决。康德把“二律背反”分为以下四种：

（一）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

（二）世界上一切都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简单的东西，一切都是复杂的，可分割的。

（三）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没有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

（四）世界的始因是存在着的；世界的始因是不存在的。

康德“二律背反”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方法。

黑格尔批评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说，这是康德哲学系统的根本缺陷，其缺陷即由于没有能力将两个思想（因为就形式看来，只有两个思想）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则说：“这两个规定，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的。这就是对这两个规定的真正辩证的看法，也是它们的真正结果。”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这一条批注说，这是“真正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9页）。

象“二律背反”一样，不能把两个思想联系起来，苏联哲学家把战争与和平联系不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系不起来，生和死联系不起来。“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这种思维方法，在我们干部中也是不少的。例如把“取”和“予”联系不起来，“购”和“留”联系不起来，“多快”和“好省”联系不起来，“质量”和“数量”联系不起来，“民主”和“集中”联系不起来，甚至连“劳动”和“休息”、“起床”和“睡觉”这样极简单的事也联系不起来。这就是说，不能理解“对立面的统一”的原理。

要学会把对立的两个思想能够联系起来的本领，就是要学会掌握“对立面的统一”的规律。学会掌握对立面统一的规律，是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的良药。

有许多人也常常说对立面的统一，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学说。所以毛主席曾说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说有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是有根据的。例如有不少人不大懂得“差异就是矛盾”这句话的意思，认为任何差异都是矛盾，便说茶杯与桌子也有矛盾。这样理解，事实上是取消了矛盾。这是不懂得矛盾是由两个对立的成份构成的。两种不同的事物，若没有同一性就不能构成矛盾。所以构成矛盾，是有条件的。茶杯与桌子，虽是差异，却没有条件构成矛盾。这个道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已经讲清楚了。毛主席讲：“原来矛盾着

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

象石头与板凳这类东西，虽是差异，却没有条件使它们构成矛盾，因为它们不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成份。

中国语言中矛盾一词的起源是很有意思的。妙就妙在是同一个人既卖矛又卖盾。同此一人，一手持矛，自夸其矛如何锐利，什么东西也挡不住；一手持盾，又自夸其盾如何坚固，什么东西也扎不进去，因此被人家抓住了他的小辫子，问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他本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经这样一问，他便答不上来。如果是两个人，一个卖矛，一个卖盾，武大郎卖瓜，自卖自夸，各夸各的，这有什么稀奇呢？这样便不能构成矛盾。两条腿走路，是说的一个人的两条腿，而不是两个人各凑一条腿。小组讨论会，你说东，我说西，意见虽是不同，却构不成矛盾。只有在同一个问题上有了不同（差异）的意见时，才能构成矛盾。

陕西兰田县志载：宋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二卷，晁公武谓此书大意“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

(见兰田县志艺文志,子类。县志谓此书已佚)。

“合有无谓之元”，意即有和无的对立面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光辉的辩证法的思想。

《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里讲“无”的作用讲得很好。搞撮秧密植的人就不懂得无的作用。舍不得调干部学习，总以为离不开工作，也是不懂得“无之以为用”的道理。

黑格尔有好多话与“合有无谓之元”这句话是一模一样的。黑格尔说：“开端在自身中包含着‘无’和‘存在’，它是二者的统一”。“在现实或思想的每个实例中都不难发现存在和无的这种统一”……“在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自身中包含存在和非存在这两者。”（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4、106页）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说：“而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提供转化、生成。”（同上书，第107页）

这里把“统一”解释为“不可分性”，非常有意思，这样就使我们把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的意思弄得更清楚了。矛盾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有和无的统一，意思就是说，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茶杯与桌子，石头与板凳之间并没有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

恩格斯说：“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反杜林论》，1970年版，第20页）。

黑格尔讲两极性时，总说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对立面。”

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接着又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

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

看来斯大林的这个消极方面是被苏联人继承下来了，而且还在发展它。例如，个人迷信不是在消灭，而是在发展，据说赫鲁晓夫被捧为“共产主义的鼻祖”。据说他们已经提出了马恩列斯赫的摆法，恐怕现在应当这样来排列：“赫马恩列斯”。

对立面的统一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是认识的规律。学会掌握对立面的统一的规律，是为了学会科学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学会把两个思想联系起来的能力，学会掌握克服片面性的武

器。例如把多快和好省联系起来，把产量和质量联系起来，如此等等。

斐洛说：“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6页）

中国人也应以老子很早就能理解对立面的统一的原理而引以自豪。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头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同上书，第407页）

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黑格尔用“不可分性”来解释“对立面的统一”的“统一”这个术语，非常重要。我的理解，毛主席在辩证法范畴中所用“同一性”这个术语，就是这样的意思。毛主席说，一切对立的成份都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例如，两条腿走路是说的一个人的

两条腿。如果不是一个人的两条腿，而是两个人各摊一条腿，中间没有联结这两条腿的东西，即没有同一性，还是无法走路。一个人用两条腿走路，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有同一性，事物才能转化。没有同一性，事物就不能转化。毛主席解释朝鲜战争为什么能够转化为和平，毛主席说因为战争双方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是什么？毛主席解释说，战争双方都有不愿继续打下去的意思，所以双方才能在板门店坐下来谈判。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双方怎么能坐下来谈判呢？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的编者根本不懂这个道理。在《简明哲学辞典》（1955年版）的“同一性”条下的注解，完全是胡说八道，无知诽谤。该条说：“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简直是无耻造谣，矛与盾之间有没有同一性是一个问题，而矛与盾是不是同一的（同一个东西），这又是一个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把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混淆起来就要引起混乱。说矛与盾之间有同一性，那意思是说，在战争中这攻守两种武器就有了联系。说矛与盾是同一的，那意思就是说，矛即是盾，盾即是矛，矛与盾是同一个东西，这两种意思不同，相差多大呀！（列宁说过，在辩证法中，用统一这个字眼比用同一这个字眼更好。）《简明哲学辞典》的编者恰恰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把矛盾双方之间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硬篡改成矛盾双方是同一个东西，然后来加以反驳。问战争与和平之间有没有同一性，是一个问题；问战争与和平是不是同一回事，又是一个问题。问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同一性是一个问题；问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又是一个问题。他们自己对两种

性质绝然不同的问题混淆不清，反而来反驳别人，实在是极端的无知。列宁说过：无知不能作为论证。他们完全忘记了列宁的话。

苏联的哲学家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错误呢？因为他们也是“二律背反”的形而上学者，他们认为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有同一性，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就看不到它们之间有同一性。

古诗词中描写妇女想念情人：又是想他，又是恨他。这所想所恨的是一个人。如是想一个，恨一个，那又有什么味道呢？“见不得的离不得”，“不是冤家不聚头”，“又是冤家又聚头”。“冤家”就是指的对立，“聚头”就是指的统一。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观念，关于辩证法，毛主席说，需要作广泛的宣传。在成都会议时，毛主席还说，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同志们在学习中，也可以这样作一下。但是举例得恰当，若不恰当，不但把问题弄不清，反而越弄越糊涂。毛主席当时曾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毛主席说：开会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总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是有缓有急，也是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的统一。

快与慢，缓与急，劳与逸，苦战与休整，都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抓住一头，丢掉一头，

就是片面性，就是破坏了对立的统一的规律，同时也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毛主席说：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个休整、补充和练兵的期间，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和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有同一性，休整和苦战也有同一性。

休整是为了苦战，苦战之后要休整，不可能一直苦战到底，毫不休息。注意：毛主席讲到这个问题时，总是说的有同一性。

顺便说一下形而上学的公式和辩证法的公式：

形而上学：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是——是， 否——否。

休整——休整， 苦战——苦战。

联合——联合， 斗争——斗争。

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

是——否， 否——是。

休整——苦战， 苦战——休整。

联合——斗争， 斗争——联合。

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就是形而上学，是陈独秀、王明的路线。

又联合，又斗争；又斗争，又联合；联合之中有斗争，斗争之中有联合，这就是辩证法，是毛主席的路线。

古书上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注释）有张有弛，文武之道，这就是辩证法。

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对立的统一，辩证法，就是全面性。

毛主席还讲：睡眠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再睡觉？“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

睡觉和起床，是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说，二者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学辩证法，就是要学会能把两种对立的的思想联系起来。

毛主席讲：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

毛主席讲：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不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是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经过斗争，又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矛盾斗争。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

毛主席讲：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

消费。生产不仅是为其他劳动者，而且也是为自己，生产者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力气也没有，就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做工作(生产)。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消费，几十年更换一次设备。

毛主席讲：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去之后，就成了反面，不叫种子，而叫秧苗。收获之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概念就举了这么多例子。

黑格尔说：有生活阅历的人，决不容许抽象的“非此即彼”的观点之阑入，而保持其自身于具体世界之中。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通，还可以读读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讲战略退却的几段文章。

在反五次“围剿”时，教条主义的军事家反对战略退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发生不良影响。毛主席反驳了这种谬论。一九三六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战略退却问题时说：“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毛主席接着又讲：“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黑格尔批评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理论，说他没有能力把两个思想联系起来。我们看看，不能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的人多着哩！因为有些人习惯于“是——是，否——否”的思维方法，习惯于“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教条主义的军事家就不能把“丧失”和“不丧失”两种思想联系起来，不能把“一时地在部分人民家中打烂坛坛罐罐”和“长时期保护全体人民的坛坛罐罐”这两种思想联系起来。如此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人必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既以与人己愈多”。诸如此类“相反相成”的道理，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必须在干部中广泛地进行教育，使干部把这些道理想通，学会把这些看起来都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想联系起来，这样就能把干部从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从形而上学走上辩证法，这样就把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了。中国是有辩证法思想传统的，加上这几年的工作经验，使干部学通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并不是太难的。生活中对立面的统一的实际例子非常多。艺术中真和假的问题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老艺人在艺术上是懂得辩证法的。

“相反相成”的道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有深刻而明白的解释。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怎么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

“丧失”与“不丧失”，是两种相反的东西。但丧失的目的，不是为了丧失，而是为了不丧失。从丧失，经过斗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达到不丧失（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丧失是手段，不丧失是目的。也就是说，用丧失的手段达到不丧失的目的。

诸葛亮懂得这个道理。他对孟获，七擒七纵。纵和擒是对立面的统一。擒是目的，纵是手段。用纵的手段去达到擒的目的。这就叫做“相反相成”。

大家知道，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仍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的“相反相成”的道理。这就是辩证法上对立面的统一的道理。

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打破那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非此即彼的、“是——是，否——否”的方法，学会掌握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方法，把两种思想联系起来的方法，

“是——否，否——是”的方法。特别是作经济工作的干部，必须学会用辩证法的方法去做工作。为什么把农村经济工作做死了？就是因为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去做的。要想把农村经济工作做活，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那就必须教育经济工作人员学会用辩证法的方法去做经济工作。胡耀邦同志的关于商业工作的调查报告，值得好好研究一下，研究形而上学方法所给与经济工作的危害的严重性。胡耀邦同志说，这几年有些产品实际上是统统购光，有卖无留，或者留量极少。下边有些地方，在收购工作中，的确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情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是自己破坏了转化的条件，造成了下次收购的困难，甚至于无可收购。正因如此，所以有的同志说，我们这几年越统越少，越少越统，越统越死。我觉得问题不在于“统”，社会主义经济对于粮棉等物资必须要“统”。问题在于如何去“统”。“统”是否就一定“死”？农村经济的“死症”是否就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有两种统法：

一种是形而上学的统法，那结果必然会统死。这就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统法。

一种是辩证法的统法，那就不会统死，而会把经济工作做活。这就是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办法去统。

有的收购工作人员，只取不予，只购不留，他们不懂得这样的结果，必然严重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群众对于生产没有兴趣了，生产不积极了，你还能收购得到什么东西呢？

“取”和“予”是对立面的统一。

“购”和“留”是对立面的统一。

“救国公粮”和“救民私粮”（即公购粮和口粮、饲料）是对立面

的统一。

再说一遍，这里所说的“统一”意即“不可分性”。“取”和“予”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样就不能光取不予。“购”和“留”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样就不能光购不留。“救国公粮”和“救民私粮”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这样就不能只顾救国公粮，不顾救民私粮，不能购过头粮。欲取先予，正是为以后多取创造条件，有购有留，正是为以后多购创造条件。

黑格尔说，辩证的东西就是在对立面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片面性就是只抓住对立面统一中的一个侧面。根本不懂得要在对立面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

保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是保护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只取不予，只购不留，不必说在农民中行不通，就是在国家机关党的机关生产中也行不通。这几年只叫大家养猪，不叫大家吃肉，这样机关养猪的兴趣也就不高了。大家都不养猪了，公家也就无从收购猪肉了。只取不予，只购不留，是自己破坏了下次取和购的条件。如果是有取有予，有购有留，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起来了，生产出来更多的东西，这样，就会如毛主席所说的，“予”又转化为“取”，“留”又转化为“购”。“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句话很合乎辩证法的道理。“民富则国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积累和流传下来的经验。孔夫子就懂得这个道理。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君，代表国家的意思。所以古人常讲“藏富于民”。到了“民鲜盖藏”的时候，百姓穷了，国家也就富不起来了。今天的经验也还是这样。老百姓不养鸡了，公家收购鸡蛋，也就收购不到了，光靠“万鸡场”是不能解决收购鸡蛋的问题的。相反的情况，家家养鸡，老百姓养鸡多了，蛋多了，公家收购也就容易了。

胡耀邦同志的调查报告中说：“农民说：‘我们不能好好地卖，你们也别想好好地吃。’海城验军公社的农民，赌气把草莓子连根拔掉。过去每年收购几万斤，现在只收几千斤。”象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这几年农村中有一种怕人民富起来的思想，是一种极端有害的思想。怕人民富的思想，来自怕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怕“自发”的思想。乡下老太太养几只鸡，卖几个鸡蛋，也说是“发展资本主义”，不让卖。可有许多怪事！有人说什么“自留地是资本主义尾巴，不砍掉对集体有影响”，“只要农民手中无东西，他就会坚决走向共产主义”，他们非常“怕资本主义泛滥”，“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我们今春在一个地方买了几毛钱的菜籽，装在信封里往学校寄，邮局不许寄，说是菜籽不许出境。封锁到这样程度，农村经济还不被统死吗？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中也说：“城乡间、地区间、公社间、甚至大队之间，也都不准自由串换。”怕发展资本主义，其实他们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在什么条件下才发展得起来。对下边干部进行一些基本知识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毛主席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要使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实在是重要极了。要使我们的干部学会掌握对立面的统一的规律去做工作，才能真正克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很显然，中央的一切政策，都是按照辩证法、唯物论的原理制定的。如果干部能从认识论、方法论上来提高，就一定能保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总之，对立面的统一，这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必须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例如，必须在取和予的统一中去把握取，取时不要忘记予。要在购和留

的统一中去把握，购时不要忘记了留。讲长远利益时，不要忘记了当前利益。强调集体利益时，不要忘记了个人（社员）的利益。强调政治挂帅时，不要忘记了物质鼓励。强调多快时，不要忘记了好省。强调产量时，不要忘记了质量。强调集中时，不要忘记了民主。强调大集体时，不要忘记了小自由。强调高速度时，不要忘记了按比例发展。强调不断革命时，不要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如此等等，反之亦然。

毛主席要我们对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作广泛的宣传。在座的同志都是有责任的。为此，希望同志们首先把这个问题学好。现在各地都开始了干部轮训，大家都就这个问题向自己熟识的同志作宣传，对他们的学习作些帮助，也算是一种革命工作。